

诸子群书

主編／張永桃 本卷主編／閻 韜

中国典籍精华丛书

第二卷



中國青年出版社

管子序
序曰春秋尊王不尊霸與中國不與諸
也是王室遷而微也見于周書夏侯之
實也弗能言其備更見諸侯之正堂
失禮也書春秋合體而異世也書以文
秋以平王東遷始其微也自東遷六十
諸亂也及其滅中國之國而後見其若
也幸不夷其宗稷齊桓之功也其中國
秋無與抗其力也見于楠詩美其存
異也存一國之風無其人則衛夷矣

中国典籍精华丛书 4

主编 / 张永桃 本卷主编 / 阎 韬

中国青年出版社

诸子群书

第二卷

作者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卢 央 卢 苏 李仁群 李作勋

杨俊光 周继旨 洪 琢 洪 璞

徐长安 阎 韬 颜世安

B220.5

2299 ✓





目 录

目
录

《韩非子》评介	(1)
一、概述	(1)
(一)韩非子及其时代背景	(1)
(二)《韩非子》成书及其流传概况	(5)
二、内容评介	(14)
(一)哲学基础	(15)
(二)法、术、势	(22)
(三)主道	(30)
(四)君臣关系	(38)
(五)防奸、除奸	(43)
(六)批判儒墨	(53)
三、《韩非子》的思想意义及其价值	(60)
(一)《韩非子》的思想意义	(61)
(二)《韩非子》的历史价值	(63)
(三)《韩非子》的文学价值	(66)
《孙子兵法》评介	(72)
一、概述	(72)
(一)孙子其人	(72)



(二)《孙子兵法》其书	(75)
(三)《孙子兵法》的影响	(78)
(四)《孙子兵法》在海外	(80)
二、内容简介	(83)
(一)“不战而屈人之兵”	(85)
(二)“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88)
(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92)
(四)“致人而不致于人”	(98)
(五)“我专敌分”	(100)
(六)“兵贵神速”	(102)
(七)“避实而击虚”	(104)
(八)“出奇制胜”	(107)
(九)关于军队建设	(108)
(十)“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116)
三、《孙子兵法》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127)

《吕氏春秋》评介	(135)
一、概述	(135)
(一)吕不韦及其生活的时代	(135)
(二)《吕氏春秋》其书	(140)
二、内容评介	(143)
(一)编著主旨	(145)
(二)战争	(151)
(三)君、臣及其关系	(158)
(四)“任贤”	(165)
(五)“民本”	(170)
(六)“德主刑辅”	(174)



(七)教育	(180)
三、《吕氏春秋》的意义、影响及其在科技思想上的贡献	(185)
(一)《吕氏春秋》的意义和影响	(185)
(二)《吕氏春秋》在科技思想史上的贡献	(187)
《淮南子》评介	(198)
一、概述	(198)
(一)刘安其人	(198)
(二)《淮南子》其书	(201)
(三)研究概况	(205)
二、内容评介	(207)
(一)论道与宇宙万物	(210)
(二)与化游息	(228)
(三)经纬人事	(235)
三、《淮南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251)
《论衡》评介	(258)
一、概述	(258)
(一)王充其人	(258)
(二)《论衡》其书	(261)
(三)王充及其《论衡》的思想和意义	(265)
二、内容简介	(278)
(一)天道自然	(279)
(二)人死无知不为鬼	(287)
(三)提倡薄葬	(292)
(四)迷信禁忌不可信	(296)



(五)反对虚妄之言	(305)
(六)人分贤佞	(310)
三、王充及其《论衡》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和影响	(312)
(一)博采众家,自成一派	(313)
(二)王充哲学的影响	(314)
(三)王充哲学的局限性	(315)
(四)《论衡》版本略说	(316)

《王弼〈老子注〉评介 (319)

一、王弼其人及其《老子注》	(319)
---------------------	-------

二、内容评介	(325)
--------------	-------

(一)本体论哲学	(326)
----------------	-------

(二)人生观	(337)
--------------	-------

(三)社会政治思想	(345)
-----------------	-------

三、王弼《老子注》的价值、影响和意义	(356)
--------------------------	-------



《韩非子》评介

一、概 述

(一) 韩非子及其时代背景

凡是读一本书,首先要做到知人论世。所谓知人,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身世;所谓论世,就是要熟悉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只有这样,才能比较深刻而全面地把握这本书的内容和意义。否则,读起来就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韩非子》的作者韩非,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时代。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韩非的生平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

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属于贵族之列。他死于公元前233年(韩王安六年,秦王政十四年),而生年却无记载。学者进行了考证,意见还不一致。有人说他生于公元前280年(韩釐王十六年),有人说他生于公元前295年(韩釐王元年),有人推算他大约生于公元前298年(韩襄王十四年)。这些说法都没有确凿有力的证据,只是一些推测,所以都很难成为定论。这样我们只好大概地说:韩非活了五六十岁。

韩非生来口吃,不善言谈,但却聪明绝顶,才华横溢,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文章。他很早就对形名、黄老之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形名是研究实际与称谓之间的关系的。“形”是“名”的内容,



韩非像

“名”是“形”的称号。形名必须相符,才是事物的正确反映。形名之学的内涵十分丰富,单就政治领域而言,如果说法令是“名”那么行为便是“形”;行为必须符合法令。如果说赏罚是“名”,那么功罪便是“形”,赏罚必须符合功罪;如果说职位是“名”,那么治绩便是“形”,治绩必须符合职位;如果说言论是“名”,那么事实便是“形”,事实必须符合言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早期法家力倡“循名而责实”(按照名称责求实际),所以形名之学逐渐成为

法家学说的别称。黄老之学是战国中期由齐国稷下学宫^①的一派学者,把黄帝的理想政治与老子的无为哲学嫁接而成的。这个学说的核心是因顺自然,无为而治。这是法家的理论基础。韩非喜爱形名、黄老之学,说明他对法家的思想学说早就非常崇信了。

韩非生长在韩国。那么,当时韩国的情况如何呢?

韩国地处黄河中游,西有秦,东有齐,南有楚,北有赵、魏,可谓强邻压境。特别是秦国崛起之后,韩国的日子更加难过。从公元前319年(韩宣王十四年)到公元前234年(韩王安五年)85年

①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代齐国统治者为了招揽和培养人才而设立的一个学术机构。这座学宫建立在都城(临淄)的稷门之外,所以叫做稷下学宫。这座学宫的鼎盛阶段是在齐宣王时期。当时各国学者都来这里讲学,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以及孟轲、荀况等各派学者都在这里讲过学,宣扬自己的观点。荀况还多次担任过这里的学术主持人。来这里的学者,齐王都赐给他们豪华的住宅,享受上大夫的待遇,让他们自由地发表言论。同时还有许多学子、士人来这里学习、研究,著书立说,最盛时达到成百上千人。可以说,稷下学宫是当时的一座兼教学、研究、著作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大学。



间,秦国攻打韩国十多次,韩国没有打过一次胜仗,不断地损兵折将,不断地丧城失地。到了后来,简直成了秦国的一个郡县。韩国国内也很混乱,君主暗弱,权贵跋扈,群臣结党营私,官吏贪污腐化,纵有一二贤良,不被诛死,也被刺杀。没有一个统一而稳定的法令,朝令夕改,一片混乱。作为韩国的公子而又具有法制头脑的韩非,面对这样暗淡危亡的局势,怎能不悲伤、不激愤呢?正是在这种悲愤的心情下,他多次上书韩王,陈述自己的观点,提出振兴的方案。然而,总是得不到韩王的采纳。于是,他决心埋头著作,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多万字,全面而系统地阐明自己的主张,尖锐而泼辣地抨击黑暗的现实,深刻而现实地提出自己的方策,企图进一步打动韩王的心弦。然而,昏聩的韩王始终无动于衷。所幸的是,他的作品流传到秦国,得到了秦王政的赏识。秦王政读过韩非所写的《孤愤》、《五蠹》两篇文章之后,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①(唉!我要是能够见到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并和他相处,那就死而无憾了!)李斯在一旁插话说:“这是韩非的著作。”于是,秦国立即进攻韩国,而且攻打猛烈。韩王安束手无策,只好把韩非派到秦国去。秦王政见到韩非,异常高兴。韩非到了秦国,为挽救自己的祖国,便上书秦王政,极力劝他攻打赵国,不要进攻韩国。这份上书遭到了李斯的强烈反对。李斯是韩非的同学,自愧不如韩非,如果韩非取得秦王政的信用,他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出于这种嫉妒心理,便在秦王政面前揭露韩非的用心,他说:“韩非这次来秦,未必不是以能够保存韩国而得到韩王的重用,他用巧言佞辞,掩饰欺诈,以便从秦国谋取利益,而用韩国的利益窥探大王的心意。”因此,秦王政迟疑不决,不敢信用韩非。与李斯同谋陷害韩非的还有一个姚贾。姚贾原是魏国看门人的儿子,曾做

^①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过窃贼。后来逃到赵国为臣，不久又被赶走，到了秦国混迹于宾客之中。有一次，燕、赵、吴、楚准备联合攻秦。秦王政得到消息后，颇为紧张，立刻召集群臣宾客，合谋对策。与会者无计可献，默不作声，只有姚贾挺身而出，自愿出使四国。姚贾带着珍珠重宝，奔走四国，凭着他的巧言和贿赂，终于瓦解了四国的联合阵线，并且同他们订立了和约。秦王政大为满意，封他千户，擢为上卿。可是，韩非却不以为然。他在秦王政面前诋毁姚贾说：“姚贾带着珍珠重宝，往来吴、楚、燕、赵之间，费时3年，珠宝用光了，四国的和约还未必可信。这是姚贾利用大王的权威、国家的珠宝，自己结交于诸侯。希望大王明察。况且姚贾是看门人的儿子，做过窃贼，又是赵国的逐臣。同这种人共商军国大事，是会使群臣失望的！”为此，秦王政当面质问姚贾。可是，经过姚贾的巧言辩解，秦王政还是相信了他。于是，李斯便和姚贾合谋陷害韩非。他们对秦王政说：“韩非是韩国的公子。现在大王想吞灭诸侯，韩非终究要维护韩国的利益，而不会真正报效秦国的。现在大王既不用他，又让他久留于秦，日后放他回国那就后患无穷了。不如加他一个罪名，把他处死。”^①秦王政听信了他们的谗言，便把韩非交给狱吏治罪去了。这时，李斯急忙派人送去毒药，让韩非自杀。韩非请求狱吏给他向秦王政申辩的机会，但未被准许。后来秦王政后悔，派人去释放韩非，韩非早已死在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监狱里了。

韩非之死，直接原因是因才招忌和因言招恨，实际上他只是个舞文弄墨的书生，毫无官场斗争的实际经验，他怎能斗过官场老手李斯、姚贾之流呢？韩非即使不死于李斯、姚贾，也会死于其他政治老手。

韩非生活于战国后期，这是中国历史大转变——从领主封建

^①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制转变到地主封建制——的最后阶段。

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的事实,得到了周天子形式上的认可。从此,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铁器获得了普遍使用,畜耕得到了推广,农村公社和井田制进一步瓦解,土地私有制成为现实,生产力获得了飞快的发展,社会经济走向空前繁荣。与此同时,新兴势力(包括地主、商人、手工业者、自耕农等)也在迅速成长和壮大。变法运动方兴未艾,百家争鸣热火朝天,兼并战争日趋激烈。

大约在战国中期,发生了两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北方是跖领导的起义,“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弄得“大国守城,小国入堡”。^① 南方是庄舄领导的起义,“吏不能禁”,^② 弄得“楚国分而为三四”。^③ 这两次起义虽然没有取得最后胜利,但却加速了领主封建社会的崩溃和地主封建社会的诞生。

到了战国后期,即韩非所处的时代,一切都很明朗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先后在鲁、晋、齐、秦等国取得了政权。变法运动在各国都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效,特别是在秦国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兼并战争由魏国始强转而为齐、秦对峙,最后变为秦国独强。百家争鸣的局面已进入尾声。战国初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中期儒家成为显学,到了后期,法家取得了绝对优势。

一切都在趋向统一。这就是韩非所处的时代,也是《韩非子》从写作到完成的时代。

(二)《韩非子》成书及其流传概况

韩非的著作是以单篇论文出现的。现存《韩非子》55篇,大

① 《庄子·盗跖》。

② 《韩非子·喻老》。以下凡引《韩非子》一律用篇名夹注文中。

③ 《荀子·议兵》。



约是在二三十年间陆续写成的。有几篇只是作了一些材料整理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写成正式文章。在韩非活着的时候,他的著作仅以散篇流行于世。前面说过,秦王政看到过韩非的《孤愤》、《五蠹》,便是一例。后来秦二世和李斯虽然都提到“韩子”,但那是人名,而不像是书名。韩非的著作编成集子大约是在西汉初年。《史记·韩长孺列传》记载:韩安国“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驸田生所。”这里的“韩子”当指韩非,“杂家说”应是韩非的著作集。为了教授某家学说的需要,把某家文章汇编成集是很自然的事。不过,这时韩非的集子还没有正式命名,笼统称之为“杂家说”,正好反映了早期编辑的情况。韩非的著作正式编定成集,很可能是西汉末年的刘向。刘向奉汉成帝之命,总领各类专家,整理、校订、编次、定名秘府中积年收藏的大量书籍。刘向每编完一部书,便在书前写出目次,并作一篇提要,送给皇帝看。后人称之为“书录”。事有凑巧,在马总《意林》卷一至卷三中摘抄了《邓析子》、《韩子》、《申子》、《新序》中的一些段落。在《韩子》篇名下注道:“刘向云,秦始皇重韩非书,曰:‘寡人得与此人游,死不恨矣!’”有的学者认为这段话便是刘向的“书录”。因此,刘向最有可能是《韩子》的正式编者。

汉代以后,书写材料发生了变化,帛、纸逐渐取代了竹简、木牍。《韩子》大约在魏晋以后便从竹简移抄到纸上了。因为在《汉书·艺文志》中只注明《韩子》五十五篇,而在魏晋以后的书目中则加注《韩子》二十卷了。由“篇”改“卷”反映了书籍制度的变化。

书名也有变化。宋代学者往往尊称韩愈为“韩子”,为了避免混淆,有人就把《韩子》改称为《韩非子》。现在一般都称《韩非子》,但偶尔也有人称《韩子》的。

我们从文献记载以及后来的官私目录书上知道,《韩子》从韩非写作起直到宋代一直流传不绝。

唐、宋时代印刷技术发展很快。至迟在南宋《韩子》已由抄卷



改为印刷了。但是,《韩子》的抄卷和印本都已荡然无存。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清乾嘉时代影抄、刊刻南宋黄三八郎印的《韩子》。因为黄三八郎印于南宋孝宗乾道元年(公元 1165 年),所以又称“乾道本”《韩非子》。这个印本有两种流传于世:一是李奕畴(字书年)所藏的原印本,其中第十四卷缺第 2 页;二是黄丕烈所藏的清初钱曾(字遵王)述古堂影抄本,其中第十卷缺第 7 页。



李书年所藏的原印本散失了。所幸的是,还有两个抄本。

黄三八郎本《韩非子》书影

1805 年(嘉庆十年)张敦仁(字古馥)借阅过李书年的原印本,并请人影抄了一部,又请顾广圻核校了一遍。可惜未加刊刻,影响不大。还有吴焘(字山尊)在 1816 年(嘉庆二十一年)也借阅过李书年的原印本,也请人影抄了一部,也请顾广圻负责校刊,并在江宁(今南京)镌刻付印,于 1818 年(嘉庆二十三年)出版。书前刊有吴焘的序文和黄三八郎的序文。书中所缺的第十四卷第 2 页也被顾广圻根据述古堂本补足,顾广圻所作的《韩子识误》附在书后。这就是一向为版本学家所珍视的“吴焘本”《韩非子》,是学术界公认的善本。其后翻刻者很多,例如 1875 年浙江书局刻“二十二子全书”,其中的《韩非子》就是根据这个本子翻刻的。1936 年中华书局编印《四部备要》,其中的《韩非子》又是根据浙江书局重印的。

至于述古堂影抄本《韩非子》,黄丕烈以 30 金买到后,又从张古馥那里借到李书年所藏的原印本。并将二书进行了仔细的校



勘,又“以别纸影抄宋刻之真者附末,庶不改影抄之旧,并可存宋刻之真”。书末还附有顾广圻、黄丕烈的跋文。此书后来为上海涵芬楼所藏。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四部丛刊》,便是根据这个本子影印的。

此外,还有“道藏本”系统的《韩非子》和“赵用贤本”系统的《韩非子》,它们都各有特色,在校勘学上都有一定的地位,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明代文人颇爱《韩非子》的文辞和风格,因而出现了一些评本、选本、注本、校勘本。晚清学者在这些方面又做出了新的贡献。王先慎是其中的杰出者。他于1896年刊印的《韩非子集解》是一部承前启后的著作,一方面总结了前人的成果,同时也有自己的创见。由于他的整理和注释,《韩非子》才成为豁然可读的书,从而在20世纪独领风骚。由于这部书的流传,热衷于《韩非子》的人及其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其中流传较广的有:1919年刊行的尹桐阳的《韩子新释》,194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启天的《韩非子校释》,195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奇猷的《韩非子集释》,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梁启雄的《韩子浅释》,198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韩非子校注》,1982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邵增桦的《韩非子今注今译》等等。至于各种选本和活页文选那就不胜枚举了。其中《韩非子集释》不仅在大陆多次重印,而且在台湾、香港、日本等地也都印行过,流布最广。

值得注意的是,《韩非子》在日本的流传也很早,且相当广泛。中国所刻的各种《韩非子》版本,差不多都传到了日本。1746年,重刻了赵用贤本,1795年又重刻了一次。1802年刊行了日本学者自己编撰的《增读韩非子》。1817年又刊行了日本学者编撰的《韩非子解诂》,这部《解诂》使用明、清两代各种《韩非子》版本参校而成。此后,日本学者便掀起了一股研究《韩非子》的热潮。

《韩非子》的广泛流传,促进了《韩非子》研究工作的全面



开展。

《韩非子》研究,在秦代已经开始,两汉便奠定了初步基础。其后断断续续,直到唐宋才有了转机。明代中期以后,各种《韩非子》评点大为流行,促进了对《韩非子》的研究。清初,考据之风大盛。考据学者们对《韩非子》的研究,积累了厚实的资料。为现代学者研究《韩非子》提供了优越条件。

1911年清朝覆亡之后,《韩非子》的研究便进入一个全新时期。据粗略统计,自那时起直到现在,研究《韩非子》的论文有600多篇,专著90种左右。此外,还有研究先秦的各种论著,也都涉及到《韩非子》。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但主要成就则在于校释和思想两方面的研究。

校释方面可分为两类:一类侧重于研究;一类侧重于普及。

侧重于研究的主要有:孙楷第的《读韩非子札记》、孙人 and 的《韩非子举正》、于省吾的《双剑谿诸子新证》、高亨的《韩非子补笺》、陶小石的《读韩非子札记》、吴闿生的《韩非子疑义考》、傅佛崖的《校读韩非子校释初稿》、刘如瑛的《韩非子校释补》、丁先的《韩非子集解校点后记》、陈启天的《韩非子校释》、陈奇猷的《韩非子集释》、《韩非子集释补》。其中陈奇猷的《集释》对于校订和注释最全面,最细致,也最有见地。虽然也有不尽完善之处,但瑕不掩瑜,到目前为止,仍是研究《韩非子》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侧重于普及的主要有:尹桐阳的《韩子新释》、唐敬杲选注的《韩非子》、叶玉麟选译的《白话译解韩非子》、梁启雄的《韩子浅解》、秋圃的《韩非子浅释》、王焕镛的《韩非子选》、周勋初等人的《韩非子校注》、邵增桦的《韩非子今注今译》。其中《校注》最值得称道,该书校改精审、注释简明,每篇之前都附有“说明”,是一本雅俗共赏的著作。其次,《今注今译》是第一个全译本,也很便于初学。

研究《韩非子》思想的论著比较释方面的多得多。研究思想



的学者大多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们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角度、新的视野研究《韩非子》的思想,所以研究的成果令人耳目一新。首倡这方面研究的当推严复和谢无量。严复抱着救亡图存的心情研究申不害和韩非学说,他说:“居今日而言救亡学,惟申、韩庶几可用。除却综核名实,岂有他途可行!”^① 谢无量则偏重于学术探讨,他在《韩非》^② 一文中说:“先述其传略,次及其渊源,次述其学说。”认为“韩非持国家主义”。接着便是胡适用西方的哲学观点审视韩非学说。^③ 其后学者蜂起,如:姜文梁的《韩非子法的哲学》、苏哲的《韩非政治法律思想》、陈汉钦的《韩非的社会思想》、陈千钧的《韩非之政治学说》、陈启天的《韩非及其政治学》等等。陈汉钦还把韩非思想与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作了比较。50年代以后,台湾学者王德昭曾写过《马基雅维里与韩非思想之异同》,显然是受了他的影响。此外,在一些先秦思想史的著作中也往往涉及到韩非,如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对韩非的思想都有所论列。

郭沫若独树一帜。他对《韩非子》的研究出于对当时现实政治的愤慨,所以着力批判韩非的君主独裁思想。但他忽略了韩非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所以显得有些偏激。

五六十年代,人们普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韩非子》,研究领域不断扩展,所以出现了一派崭新的气象。任继愈的《法家的创始者韩非子的学说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李宗茂的《谈韩非子的若干经济观点》、周鍾灵的《韩非子的逻辑》等等,便是这一时期的新成果。

① 《学衡》第7期《与熊纯如书》,又《严几道年谱》。

② 刊于《大中华》1卷7—12号。

③ 详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70年代以后,研究《韩非子》的文章蜂拥而出,把《韩非子》捧上了九霄云外。因为出于政治实用主义,所以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

80年代前后,《韩非子》研究又逐步恢复到正常轨道。除了过去经常讨论的老课题外,又开拓了一些新课题,如韩非的爱国主义思想、宣传思想、美学思想、人口思想、心理学思想,还有周鍾灵等人所编的《韩非子索引》等等,反映了《韩非子》研究的天地正在扩大。

50年代至今,港台学者也出了不少研究韩非思想的成果。论文四五十种,专著十来部。如赵金海的《韩非子研究》、封思毅的《韩非子散论》、张素贞的《国家的秩序——韩非子》、张纯、王晓波的《韩非思想的历史研究》等,论述都比较平实,值得一读。

此外,日本学者对《韩非子》的研究也很重视,清末以来所出论著不下30种,其中成就最大的有太田方的《韩非子翼毳》、藤泽南岳的《评释韩非子全书》、松皋圆的《韩非子纂闻》等等。这说明《韩非子》的价值,已为世界学者所注目。

关于《韩非子》的真伪问题,虽在宋代就有人提出过,但直到现代才正式成为一个研究课题。现代首论者是胡适,他“以学说内容为根据”,认为“《韩非子》十分之中,仅有一二分可靠,其余都是加入的。那可靠的诸篇如下:《显学》、《五蠹》、《定法》、《难势》、《诡使》、《六反》、《问辩》。”^①接着容肇祖承其意而作《韩非子的著作考》(后改为《韩非子考证》)。从此以后,《韩非子》的真伪问题便成为一桩公案。凡涉及《韩非子》的论著,大多涉及到这个问题。结果,连胡适认为可靠的《难势》也被怀疑了,只剩下其余6篇为大家所公认。前几年陈奇猷先生对这个问题作了一番整理,并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驳议,最后结论说:“总上所述,《韩非子》

^①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5月再版第365页。